

盐城师范学院

毕业论文

严歌苓创作风格多样化及其原因探析

学生姓名 张硕

学 院 文学院

专 业 汉语言文学(师范)

班 级 汉语文学 14 (4) 师 (卓越实验班)

学 号 14111243

指导老师 黄皎碧

2018 年 5 月 16 日

严歌苓创作风格多样化及其原因探析

摘 要

被称为“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的新一代移民小说作家严歌苓，她的小说创作近年来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目前文学界对严歌苓整个创作风格历程的研究较少，大多为单篇作品解读。她的创作时间跨度大，涉猎题材多，纵观其整体创作，她热衷创作的女性形象与她出生的时代及自身经历密不可分，个体叙事，女性叙事，历史叙事构成了她创作的主要主题和多样化风格，本文主要从这三个方面对其作品进行整体研究，并尝试分析其创作风格多样化的原因。

【关键词】 严歌苓；创作风格；多样化

Diversification And Reasons of YanGeLing's Writing Style

Abstract

Yan Geling, a new emigrant writer who is known as "turning her hands for desolation and covering her hands with prosperity",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At present, there are few researches on Yan Geling's whole writing style. She has a large span of time and a lot of subject matter. Throughout her creation, the female image she loves to create is closely related to her birth times and her own experiences. Individual narrative, female narrative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constitute the main themes and diversified styles of her creation. This article mainly carries out her works from these three aspects. Overall research, and try to analyze the reasons for the diversity of their writing styles.

[Key words] Yan Geling, Creation style, Diversity

目 录

引 言	1
一、严歌苓创作风格多样化	1
(一) 个体叙事	1
1. 军旅生涯	1
2. 移民经历	2
3. 边缘创伤	3
(二) 女性叙事	4
1. 女性觉醒	4
2. 自我救赎	5
3. 畸形爱恋	6
(三) 历史叙事	6
1. 特殊历史时期	6
2. 海外华人历史	7
二、严歌苓创作风格多样化的原因	8
(一) 家族的沉淀，青春的烙印	8
(二) 文革的创伤，情感的曲折	8
(三) 身份的变化，阅历的变迁	9
结 语	10
参考文献	11

引 言

严歌苓是海内外华语文坛中最受欢迎和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她对于东西方文化有着独特的见解与诠释，受到中国许多导演的青睐和广大读者的好评。家庭复杂的成份背景，国家文革时期的动荡，移居美国后的艰难困苦，汇聚成了严歌苓写作的深厚来源，丰富的人生阅历使她笔耕不辍，成就了一个又一个的经典人物形象。严歌苓的笔，真的可以用“风情万种”来形容，她的小说每次读完后内心的颤动都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目前文学界对严歌苓整个创作风格历程的研究较少，大多为单篇作品解读。她的创作时间跨度大，涉猎题材多，纵观其整体创作，她热衷创作的女性形象与她出生的时代及自身经历密不可分，个体叙事，女性叙事，历史叙事构成了她创作的主要主题和多样化风格，本文主要从这三个方面对其作品进行整体研究，并尝试分析其创作风格多样化的原因。

一、严歌苓创作风格多样化

（一）个体叙事

严歌苓所热衷创作的女性形象与她出生的时代及自身经历密不可分，正值 1957 年，中国大地上不同性质的运动层出不穷，那个时代给了严歌苓无尽的写作灵感来源，政治斗争对于底层百姓的生活所带来的动荡影响了几代人的命运，严歌苓创造不同的人物，也正是在书写和记录自我。莫言曾说过，作家不必写自传，因为他所写的每本小说，都是自传的一部分。无论是初入文工团的穗子，移民美国的少女小渔还是生活在两种文化之间的多鹤，都能从中窥得严歌苓自身经历的影子。

1. 军旅生涯

严歌苓曾坦言《芳华》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 12 岁到 25 岁的军队岁月，进了文工团开始跳舞，后来成为了部队的专职创作员，所有的青春岁月都在文工团中度过，严歌苓将所有的青春年华都凝结在了《芳华》之中，在这段时光里，严歌苓和战友朝夕相处，培养出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所以小说中的场景描写的都极其细致入微，这本书是最贴近严歌苓及其自身生活的一部作品。过早进入文工团这一复杂的大环境，使得严歌苓的心中滋生出一种敏锐，旁人未曾留意的细节，真实的或虚伪的，美好的或是黑暗的，她都能抓住储存在心底，等待着年华的浇灌，酝酿成一个个凄美动人的故事。

《芳华》中严歌苓将自己的青春故事分为一段一段，安插在不同人物的身上，萧穗子，何小萍，分不清到底谁才是青春时期的严歌苓，许是半生历戎马，归来仍少年。

何小萍对于舞蹈的执拗与热爱，正是严歌苓八年舞蹈青春的写照。书中何小萍深夜独身一人在舞蹈房练舞，她渴望站到舞台上不停地旋转跳跃，得到大家的认可，严歌苓在文工团中便是如此拼命，凌晨四点钟就开始练功压腿，甚至写信的时候也不放过压腿的机会，从不懈怠。何小萍是她的化身，她要把自己热爱的事情做到极致，如此执着的性格使得严歌苓在写作这条路上找到自我并做到了极致。

而萧穗子是严歌苓青春时期野心和幻想的心理成长缩影，在十几岁到二十岁出头的转变期，世界观人生观尚未成型，萧穗子的形象带着严歌苓年轻时的稚嫩和朝气，也夹杂着幽深细腻的心理阴暗面，这是严歌苓以平和持重的心情回首青春岁月时的心迹。

2.移民经历

海外评论家陈瑞琳生动地指出了“移民”对一个作家的巨大影响：“移民，本质上就是一种生命的移植。移植的痛苦首先是来自于根与土壤的冲突，在新的土壤中，深埋的根才会敏感地裸露，移民作家才能真正地走出‘庐山重雾’，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命脉。与此同时，在时空的切换中，根的自然伸展也必然在新的土壤中进行吐故纳新。这个时候，生长在海外的移民文学，就有了她独异存在的生命。”^[1]陈瑞琳的这段话是对严歌苓赴美后写作风格的变化最贴切的诠释。

严歌苓初到美国，努力适应异国生活的同时，将笔触深入初入美国的中国女性，创作了《少女小渔》和《无出路咖啡馆》，对于她们的精神困境和生活窘境揣摩地十分细致入微，严歌苓也是其中一员，作者自身的经历可从她的作品中窥见，有的表现在主人公的身上，有的表现在配角身上，有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细节却是真实存在过的。

严歌苓曾说过人在寄居篱下的时候是最富感知力的，作为女性本身也细腻敏感，她说：“移民的过程对内心来讲是个很大的创伤。”^[2]对于陌生的外部世界感知更是丰富入微，痛而清醒着，痛并快乐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说：“痛苦——要知道，这是产生意识的唯一原因。”^[3]在这个时期，她的文字有了更多元的意味。

《无出路咖啡馆》属于带着严歌苓自身烙印的自传性作品，“无出路”的深刻内涵代表着她内心的困境和孤独，在异国他乡备受折磨，无人可倾诉，失眠也长期困扰着严歌苓，精神压力无处发泄，情感层面没有寄托，“无出路”不仅仅是地理方位上的迷失，而是心理层面上的迷失。

《少女小渔》的女主人公小渔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女性形象，她具有强烈的奉献精神，顺从着江伟的安排，为了拿到绿卡在美国生活下去，小渔面对可笑的假结婚提议，她却

对江伟没有任何不满和反抗。江伟受了委屈而哭的时候，小渔没哭，她觉得“不然俩人都哭，谁来哄呢”。小渔具备着中国女性特有的朴素贤惠，外在的浮华完全没有影响她美好的心灵，她和美国老头生活在一起后，面对老头的百般刁难和纠缠，小渔从未有怨言，看到房间凌乱她立马收拾，小渔身上总有一种奉献的惯性，那是源自于骨子中的真善美。

严歌苓移民后的作品中，其主要表现的是人在陌生环境中的迷失和爱恨纠葛。小渔所居住的嘈杂破败鱼龙混杂的合租公寓和美国的繁华社会形成赤裸的鲜明对比，移民女性一直处于美国社会的边缘和底层，严歌苓作为文化工作者，受到的冲击更为深刻。

3.边缘创伤

严歌苓的作品中很多以底层女性和边缘化女性为叙事主角，《小姨多鹤》中的多鹤，命运多舛，小时候跟随着日军侵华的步伐来到中国垦荒，战争结束却被遗留在华，无人过问死活，之后被卖给二孩张俭，张俭的老婆不能生育，于是多鹤变成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工具，她的命运无法掌控在自己手中，无法选择自己的爱情、婚姻，只得寄人篱下。多鹤拥有着日本传统女性的贤惠品质，把张俭当作丈夫，一心一意照料家里，为他生儿育女。然而多鹤越是珍视张俭，张俭却随时可以丢弃她，存在于他们之间的不是爱情，而是利用的关系，多鹤天真温柔，张俭只是一时被情欲占据头脑，他无法保护多鹤，爱情无法救赎多鹤这样一个身世复杂的“边缘人”。

多鹤和严歌苓一样，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她们身上交汇重合，游走在两种文化之间，她们属于自己的国家，却又和故土格格不入，后天的生活烙印融入血液之中，多鹤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十几年，可是她仍然保持日本的传统，教亲生孩子说日本话，把地板擦的锃亮，在屋里穿袜子不穿鞋子，她执拗地不改这些生活细节，保留着故土给予她的印记，但是当她回归日本故土，已经无亲无故，一个人寂寞孤独地生活在日本，好像无法融入。

严歌苓称自己为“边缘人”，即使长期生活在美国，不断使用英文写作，但严歌苓从未真正融入美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疏离感和陌生感，她总是感觉自己漂泊在异国他乡，“每一个不同的时代和民族都有漂泊的记录”。^[4]情感上的无所寄托使得严歌苓将全身心投注于写作。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莱斯利·A·怀特认为，“文化是一种精巧的机制，其功能在于使人类群体的生活安稳可靠和延续下来。”^[5]她笔下的多鹤正是她自我经历的重现，有的故事或许是虚构的，而严歌苓就在这些人物和自我之间游离、变换，亦真亦假。

（二）女性叙事

女性一直是严歌苓作品中的主角，文革时期和移民生活为严歌苓带来了丰富的视角，如此开阔的视角使得我们望见了不同女性人物的生活，严歌苓的笔下可至云霄，下可入尘埃。她用独特的笔触深入挖掘所接触到的和吸收到的不同阶层的人物故事，加入自身的经历酝酿出当今社会的属于不同人物之间的爱情悲剧。

1. 女性觉醒

《第九个寡妇》讲述了抗战时期河南农村 8 个年轻的寡妇认领了八个八路军战士而牺牲了自己丈夫的义举的故事，严歌苓另辟蹊径，未曾在这件义举上多费笔墨，而是以此为线索引出了第九个寡妇——王葡萄，村里的妇女唯有她是认领了自己的真正的丈夫，但丈夫铁脑却在深夜被一枪毙命脑袋开花。在随之而来的土改运动中，公爹孙怀清被判死刑，王葡萄想尽法子将孙怀清藏于红薯窖中数十年，几次险些被人发现，但是王葡萄凭借着她的善良执拗的生存智慧化险为夷，为了保住这个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公爹，王葡萄舍弃了与孙少勇的爱情和自己的亲生儿子，拼尽全力护孙怀清周全，在那个混乱的年代，王葡萄独身一人扛起了这样一个天大的秘密，她心中的纯良勇敢使她拥有了抗下所有苦难的力量。

表面上看王葡萄思想落后，她只知晓每天要纳的鞋底，猪圈里的小猪崽子，灶头里的饭菜，嘴上总念叨着“我能吃苦，可不能吃亏，吃亏才苦着哩，”实则王葡萄活的大气超脱，无论是土改，四反还是文革，她无动于衷特立独行，继续坚守着自己内心的善恶标准，更突显了自己与这个荒诞社会的格格不入。对于那时被下放的作家老朴，她慧眼识得老朴与自己同属一类人，出身穷苦又重感情，葡萄才向他吐露了藏匿公公的秘密，而后老朴荣归史屯，葡萄并不见外让老朴剥猪食。老朴命运起起落落，在王葡萄眼中关系从未改变。她守着心中的净土和纯净的人性，在混乱迷惘中保持清醒和自己的判断，在那个集体主义盛行的时代，显得尤为特别和耀眼。

严歌苓一改中国农民愚昧落后的形象，向读者展现出了河南农村中属于一个女人的壮美史诗，道出了人性的阴冷无情复杂，更突显出了王葡萄的坚韧豁达和纯净。

“她处处表现出与传统相背离，无时无刻不表现出自我的存在，在外人看来她是一个不正常的人，”^[6]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严歌苓要塑造的王葡萄，不再是屈服于男权下的弱势女性群体，她敢做敢当，毫不逊色于寻常男儿家。严歌苓笔下的女性主义不仅是自我独立和自我觉醒，而是建立在人性之上，包括了男权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平等价值。

为了更好的说明严歌苓笔下的王葡萄这个形象的特殊之处，我们可以借助张贤亮

《绿化树》中的女主人公马缨花进行对比分析。

在张贤亮的笔下，马缨花是与王葡萄一样的传奇女子，同样地坚强奔放，同样地敢爱敢恨，拥有着少妇的韵味与风骚，她们在动荡的境遇下，以不屈的生命力绽放盛开，最大限度地用尽自身力气去守护内心那份纯粹，无怨无悔地执着于自己的内心，她们的文化层面是贫瘠的，但精神世界丰满而性感。在章永璘的劳改生涯中，马缨花的出现像他黑暗世界中的一束光，引领他走出压抑与困窘。

马缨花与王葡萄一样身上流淌的是母性，这是超越了人性的极致存在，在那个年代人已不像人，失去了做人的底线和人格尊严，物资极其短缺匮乏，王葡萄想尽法子养活了孙远清数十年，马缨花则利用巧妙的人际关系供养了章永璘，她们在这样战乱灾荒的动荡年代，坚守着自我，使得这两位女性身上的母性光辉愈加闪耀。

2. 自我救赎

在《扶桑》中，严歌苓以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妓女扶桑作为文中的主角，而在《金陵十三钗》中，则是一群妓女成为了严歌苓情感的寄托者。她笔下的妓女打破了人们对于妓女这一特殊群体的固有偏见，她们身上的纯良和善意被挖掘出来，为了拯救那群曾经鄙视她们，自视纯洁的女学生免受日军的暴行，她们自愿成为替罪羔羊，毅然选择为保护他人生命而牺牲自己。

这是一个美丽而残忍的故事，这也是一场向往平等的救赎，当这些妓女踏入教堂的那一刻起，这些女学生就注定不可能再是之前的女学生了。这些女学生一边骂着妓女们脏，一边又忍不住好奇心去看他们。她们在一开始将自己放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看不起、蔑视这些靠两腿间私密处谋生的女子们，她们禁止这些妓女上教堂的厕所，不给她们喝汤，还要辱骂她们“烂冬瓜”、“臭婊子”。然而在豆蔻的惨死之后，她们又忍不住为她哭泣。

最后的最后，圣诞的前夕。这些女学生们口中骂着的女人们，替她们赴了一场不可能回头的死亡宴席。这些装扮成学生的妓女们，是整个南京城里最漂亮最夺目的一群“女学生”。玉墨们本来是自甘堕落的，却在最后义无反顾从容奔赴一场必死的暗局，这是属于她们的自我救赎，在见证了太多身边人的死亡，阿顾的死，豆蔻的惨死，小兵王浦生和伤兵李全友被日本兵残忍地杀害，而玉墨眼睁睁地看着暗生情愫的戴少校人头落地.....这一切在无形之中使得玉墨们完成了她们内心的深层蜕变和人性的展露升华，她们不再是不知亡国恨犹唱后庭花的风尘女子，而是选择挺身而出背负国仇家恨从容奔赴了属于她们的战场。女性往往是战争罪恶最大的受害者，除了死亡的威胁，还要面临丧失尊严的侮辱。侵略者进犯和辱没另一个民族的女性，其实奸淫的是那个民族的尊严。

玉墨们用生命守护了女学生们的尊严和圣洁，完成了对于自我的救赎，用爱和生命换回了这个民族的尊严。

3.畸形爱恋

严歌苓在搜集写作素材时，偏爱社会小众题材，她的创作灵感很多往往来源于中国社会新闻，严歌苓作为中美文化的边缘人，以独特的视角看待社会时事。《老师好美》改编自一个当时震惊全国的真实事例，人们或许还未翻开一页，就已经在脑海中有自己既定的印象，对于人物的解读和想法，这类素材往往不好把握，严歌苓打造出了被中国应试教育体制、刻板家庭教育方式所压迫的少年形象，但是老师丁佳心的形象却塑造得不够丰满，严歌苓的这篇《老师好美》受到世人瞩目的原因，可能是因其是旷世的畸形爱恋，情节却朴实平凡。

《老师好美》中丁佳心的形象不同于以往严歌苓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她是一位受人爱戴和尊敬的老师，但她却没有把握作为一名老师的底线和尺度。丁佳心作为一名班主任所以能够轻易地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但她没有保持好距离，所要传播的爱、奉献与美好，顷刻之间使得两名学生争风吃醋，化为杀人的利器。丁佳心的内心无比自责，她对自己的罪恶进行忏悔：“你最后向天一举刀的动作，霹雳一般的动作，是由于巨大的积蓄能量引发的，我那条信息应该是误给你的第一盎司能量，我的犯罪开始了。”

这个故事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批判中国的高考制度对于青少年心理和生理的高度压迫：当两个十七八岁血气方刚的男孩儿被高考的重压压迫得喘不过气来时，纯粹的校园青涩爱恋就略显乏味平淡，畸形爱恋的吸引力使得他们紧张压迫的神经找到了释放的出口。同样地刘畅的母亲用赌博来缓解精神上的压力。刘畅在冲动下杀死了邵天一，表面上看是为争夺老师丁佳心的偏爱和暧昧，实际上就如文中所写，他想杀的人多了：复习，模拟考试，制定高考的人。在现存的中国教育体制下，他们都是受害者，是最弱小和最卑微的芸芸众生。

（三）历史叙事

1.特殊历史时期

对于《天浴》这部小说，严歌苓的解读也是对“文革”的批判，认为“文革”是造成文秀命运悲剧的根源。“文革”只是这个故事发生的一个背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人性之恶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扫荡完尽人性的特质，所有的美好顷刻化为废墟荡然无存，严歌苓所要批判的不仅仅是一个背景，而是深藏其中荼毒女性的男权，即男性的绝对特权对于女性的伤害。而这种伤害，就是对文秀身体上的侵犯。

严歌苓运用电影中长镜头般的叙事手法，淋漓尽致写尽了草原上侵犯文秀的男人们令人作呕的丑陋嘴脸，就连失去男根的老金，骨子里的男权思想也依旧根深蒂固，他对于文秀被侵犯时少有作为，仅仅是将男人们的鞋子拿走扔掉，为了回城文秀把自己年轻的身体变成了被男人肆意玩弄糟蹋的商品，她依附于强势的男权之下，被病态扭曲的思想洗脑，正如戴锦华所言“男权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权利的暴力性、权利必然不断制造偏见的特征已是我们社会的基本事实”^[7]到最后选择结束生命之时，文秀竟还是用自己的身体央求老金了结自己，她吻上老金满是旱烟味的满是胡茬的嘴，原来那个纯洁透明的灵魂已经消失殆尽。

男权意识侵蚀着那个时代的女性，她们依附于强悍的男权之下，好像自己不属于女性群体，毫无反抗地遵从着男权社会的通行法则，她们成为了残忍的施暴者，被男权意识深深洗脑的女性也是使文秀走向灭亡的最大帮凶，文秀去医院打胎身体和心理受到双重打击时，护士们非但没有流露出怜悯和可怜，而是用恶毒的言语打击和唾弃文秀，使其走向毁灭的深渊。文秀在一次次被玩弄身体后，被男权意识深深洗脑后，彻底沦落为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后，死亡成为她最好的归宿和解脱。

2.海外华人历史

《扶桑》的故事来源于严歌苓在旧金山唐人街历史陈列馆看到一幅 20 世纪 60 年代的妓女照片，和美国史学家编纂的关于当地华人的几十部史书。以此为雏形加上异国之恋的传奇色彩，严歌苓将神秘的侠客、当地动荡混乱的底层社会等不同的元素源源不断地注入这部作品之中，甚至略带着魔幻现实主义色彩。

整个故事中不断被插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来叙述，但主要是以第三人称来建构完成整部作品的。一百六十部被遗忘在角落的史书中追寻扶桑的痕迹，扶桑代表着那个时代无数身世凄惨飘洋过海到大洋彼岸的妓女的缩影，尚未开化的中国传统女性突然被置身于西方文化环境之中，这样的鲜明冲击使得故事更为离奇迷人。

扶桑的命运基调就是苦难，成亲之时和一只大公鸡拜的堂，愚昧可笑，忽然镜头又转向遥远的西方彼岸，她的骨子里有一份属于弱者的坚毅，不可侵犯。扶桑善于扭转自我的心态，她需要爱情，却不需要爱情来救赎，她与男主人公克里斯注定是一场悲剧的结局，“在悲剧体验中对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反抗，才是生命的真实，在反抗中走向最高存在物的努力，才是对真理的探求。”^[8]他们之间折射出的是西方与东方文化几个世纪的差异和隔膜，移民者处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汇处的尴尬的弱势地位，从原来的黄土壤中拔根而起，在彼岸的西方也没有容身之处。拨开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迷雾，移民者与原住民之间的隔膜依旧存在，略带攻击性与敌意，华人的境遇未曾乐观过。

二、严歌苓创作风格多样化的原因

（一）家族的沉淀，青春的烙印

如杜甫所说“诗是吾家事”，严歌苓出身于书香世家，严歌苓的父亲，祖父都是作家，严歌苓的祖父严恩春十六岁已经登入大学门槛，而后赴美留学，二十五岁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实属天才型人物。小时候严歌苓就在家中翻看祖父留下的丰富的藏书，文学的慧根在那时就已种下，在她此后的生命中滋生蔓延。在第一篇处女作完成后，严歌苓拿给父亲看，萧马被女儿出手不凡的才华所震动，她完美地遗传了祖父严恩春的所有特质，包括她之后的赴美留学，像是冥冥之中生命的轮回。

严歌苓的父亲萧马是我国著名剧作家，他的见识和品位直接影响了严歌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萧马多彩多艺，无论是油画还是小提琴都有涉猎，那份超脱和大气在一般人中难以见得，严歌苓自己也坦言，如果换了一个家庭，也不会成就今天的自己。她的人生缺少任何一环，都不会成就如此的严歌苓。

纵观严歌苓创作的作品，大多题材的背景都处于国家动乱时期，这与严歌苓自身的经历密不可分。在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紧要关头之际各方战士的心理压力重重，为了缓解压力和提高士气，文工团应运而生，它以文艺形式慰问保卫边疆和祖国的战士，之后慢慢发展蔓延。严歌苓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考入成都军区文工团，年方十二就成为了一名跳芭蕾舞的文艺兵，八年的文工团生涯对她后期作品风格的形成影响巨大。1979年中越爆发边境冲突，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于在边境挑衅和侵犯的越南军队进行沉痛打击，严歌苓正是在此时主动请缨，奔赴前线，以战地记者的身份记录下前线紧张的局势，2017年末由张艺谋导演的《芳华》被搬上银幕，这部作品像是对四十年前严歌苓文工团生活的回忆，严歌苓将自己的舞蹈生涯和战地体验穿插其中。而后她专职创作，军旅生涯给了她无限的创作来源和素材。

（二）文革的创伤，情感的曲折

关于文革时期国家动乱的题材在严歌苓的作品中占据一席之地，严歌苓绝对是最大胆的一个，也是最巧妙的一个，她游走在政治底线边缘，巧妙躲开政治雷区，将个人情感放置于国家大背景之下，并不是将矛头指向具体事件，严歌苓能够游刃有余地一直写下去，或许这与她“边缘人”的身份密不可分。在那个人性荡然无存的年代，严歌苓总能发掘出一丝残留的美好，女性成为守护美好的主力，无论是信念还是迷恋，执念，严歌苓将最后一丝的人性续写，中国人的信仰或许从那时就已经缺失，精神仍是一片荒芜。

移民国外后，站在一定距离外再次审视这段历史，严歌苓的历史视角空前宏大。

严歌苓早熟早慧，在十二岁时就已经进入文工团，置身于那种环境之下她突然学会了看脸色，不再是无忧无虑的小女孩，或许是想在情感上找一份寄托，她的懵懂爱恋早就开始萌芽。在《灰舞鞋》中，严歌苓描写了一个十五岁的文艺小女兵爱上二十二岁排长的故事，而后被分队长横刀夺爱抢走了排长。这分明就是严歌苓自己的青涩爱恋故事，那份小女兵的痛苦和煎熬正是她自己经历过的。采访中她自己曾坦白，在文工团时爱上一个比自己年长三十岁的男人，偷偷写了长达千字的情书，被告发后险些葬送自己的文工团生涯。

严歌苓的第一段婚姻可谓是门当户对，她与李克威的相遇也充满着罗曼蒂克式的风格，而后相恋结婚，在经历了一段婚姻生活后，两人却因两地分居而劳燕分飞，看似表面男才女貌，严歌苓却发现两人的人生目标与追求渐渐偏离，她的骨子里有一股犟劲儿，想要出类拔萃，而李克威却看得很淡，这导致了两个人最后分开的结局。这段曾经神仙眷侣般的婚姻给严歌苓的创作生涯烙下深深的印记。

她的第二段跨国婚姻也充满戏剧化，现任丈夫劳伦斯是美国外交官，当时美国 FBI 对严歌苓进行了数次盘查，劳伦斯不忍心让严歌苓再受一丝委屈，毅然决然放弃了外交官的工作，坚守与严歌苓的爱情。在异国他乡终寻得一个温暖可靠的臂膀能够依靠，劳伦斯幽默大度体贴，可谓是灵魂伴侣，幸福圆满的家庭生活给严歌苓带来源源不断的写作灵感，她慢慢进入写作佳境。劳伦斯精通九国语言，便由他亲自完成了《少女小渔》的英文翻译。严歌苓随着劳伦斯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各地见闻极大地激发着严歌苓的创作灵感。

（三）身份的变化，阅历的变迁

自十二岁踏进文工团开始，严歌苓的身份在岁月的见证下一直辗转变化着，芭蕾舞舞蹈文艺兵，战地记者，专职创作员，家庭主妇，移民者等等，这些丰富的人生经历组成了一个多元的严歌苓。

1989 年，三十岁的严歌苓决心赴美读书深造，这是对于她人生的一次洗牌，在异国他乡重新开始，严歌苓的勤奋和高度自律使她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障碍和荆棘，出国或许对于很多中国本土作家来说是毁灭，而对于严歌苓来说是涅槃重生，使她又站在了人生的另一个巅峰之上。

在她出国前的创作中，具有标志性的一部作品就是《雌性的草地》，其中蕴涵着下一时期创作的精华与风格流向。这部作品性感，赤裸，直接，真诚。严歌苓那时的笔触

以华美凝练为主要风格，醉心于多重视角的转换，倾向于深厚浓重的写作技巧。而在美国时的作品则呈现出干净简朴，脱离了原来常用的写作技巧，返璞归真，更值得读者回味与推敲，都是不容被否定的。

移民后期的严歌苓对于英文写作开始驾轻就熟，评论家雷达盛赞严歌苓小说《扶桑》的语言“富于张力，自由联想，打开通感，比喻甚新奇。作者似有头发丝般精细的敏感，锋利而尖刻的穿透对象的笔力”^[9]，她曾在接受采访时提过，初到美国语言上的障碍与艰难，后来学会使用英文写作，中文写一遍，英文再写一遍，酝酿出不一样的味道。严歌苓的文化深度就是在这一次次改写中积淀而来的。

作为中美文化的观望者，严歌苓以独特视角审视两国的文化差异，她行走在两种文化边缘以自己身份的特殊化，对女性形象进行不断的探索，力求表现移民经历带给女性的心理创伤，严歌苓不断找寻着两种文化的重合，与其说是写不同时期的女性，倒不如说是在写严歌苓自身的经历和心理蜕变，她笔下每一个人物的身上都可以窥得她的影子。移民国外后，站在一定距离外再次审视这段历史，严歌苓的历史视角空前宏大，善于在大环境下将小人物的爱恨情仇情感纠葛表达的淋漓尽致。

结 语

严歌苓的小说总是被冠以“史诗”之名，她本意并非要构架史诗级的宏大规模，善于用个人化边缘化小人物的故事以不同的叙述视角娓娓道来。她一边行走一边抒写，巧妙地运用个人独特的心路历程和极具张力和穿透力的手法将其内化为一部部经典之作。

正如罗素所言：“有大型的历史学，也有小型的历史学，两者各有其价值。但它们的价值不同。大型的历史学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是怎样发展成现在的样子的，小型的历史学则使我们认识有趣的男人们和女人们，推进我们有关人性的知识。”^[10]严歌苓所创作的作品仿佛一部小型的历史学，她用小人物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人性的转变和光辉，这也是属于她作品的独特魅力。

严歌苓曾说过，她要讲好听的故事给大家听，她的角色仿佛在扮演一个故事的讲述者，娓娓道来不紧不慢，她笔下的故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听，而是可以用“风情万种”来形容。她用细腻温柔的笔触抒写着又一个一个的人物传奇。少女小渔，寡妇葡萄，女兵穗子，小姨多鹤或者是妓女扶桑，都令人难以忘怀，这正是严歌苓的魅力所在。凭借这些作品使她成为了新移民作家中不凡的东方女性书写者和塑造者。

参考文献

- [1] 江少川, 陈瑞琳. 海外新移民文学纵横谈——陈瑞琳访谈录[J]. 世界文学评论, 2006(2):7-10.
- [2] 严歌苓, 木叶. 呆下来, 活下去[J]. 北京文学, 2002(11):26-27.
- [3] 陀思妥耶夫斯基. 地下室手记: 中短篇小说集[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0.
- [4] 张凤. 漂泊心灵——北美华文女作家笔下的漂泊性及其殊异[J]. 南昌大学学报, 2003, 34(5):109-113.
- [5] 莱斯利·A·怀特. 文化的科学[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 [6] 严歌苓, 木叶. 故事多发的年代[J]. 上海文化, 2015(1):51-68.
- [7] 戴锦华. 失踪的母亲: 电影中父权叙述的新策略[J].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8):94-107.
- [8] 徐凤林. “悲剧哲学”的世界观——舍斯托夫哲学的生存论解读[J]. 求是学刊, 2009, 36(5):13-18.
- [9] 雷达. 我读《扶桑》[A]. 严歌苓. 严歌苓文集. 扶桑[C].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3.
- [10] Bertrand Russell. On History[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1.